

“世界中”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亚思明

10月12日至13日,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在威海校区主办“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40余所高校院所和研究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与会者就“世界中”的中华民族文学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红军主持开幕式。

整体性观照下的史料整理和文学史建构

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建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致辞,并就“百年文学史中的真史与伪史问题”作大会发言,认为真史是为历史和未来负责,伪史是为现在“负责”,并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为例,来说明唯有在掌握了真实的情报档案和原生史料后,才能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判断。丁帆认为,文学史料的欠缺和封闭是当下资料整理与研究运用的难点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在一个平面阅读的语境中,那些作家作品可以被充分地误读,也可以在语词的喧嚣中彻底形成巨大的歧义”,有可能舍弃的就是那些最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针对当下的史料热,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也提出要进行冷思考。他说,上世纪90年代文化反思之后,史料研究进入了研究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宏大叙事进行了纠偏。但另一方面,文学史料研究也走向另一个误区,史料与资料混而为一、学科与学术不分。因而当我们写作文学史,进行史料研究时需要有学科边界。近20年来报刊研究趋向于碎片化,忽略了文学史上重要的报刊杂志。非重要的报刊虽对个体研究很重要,但对文学史整体发展影响不大。

山东大学教授马兵认为,在史料学已经成为现当代学科显学的当下,史料收集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方向,也因此带来一定程度上内循环式的封闭研究,必须警惕只有史料而没有思想统领的偏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偏失,而产生了认知上的分歧。例如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认为,发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核心传统。但是近年来,早已确认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命名正在被“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名词取代。他区分了“新文学”与“五四文学”两个概念命名的不同。“新文学革命”的主要行动,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已经完成。“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是受到了《新青年》展开的新思潮和“民主”“科学”精神的影响。他认为,“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经典命名与自身内涵的合一,“五四运动”

就是“五四运动”,“五四”别无分店。

世界性拓展中的海内外语境的对话与交流

会议的另一大议题,便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中”这一重要现代情境的考量。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王列耀主要从百年文学史的观念与版图两方面来探讨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播问题。王列耀认为,“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合二为一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反之亦然,“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中国文学就是中国人在海内外用各民族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也理应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得到研究。再者,百年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方式多元多向,包括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生产和在海外出版社的出版。传播不仅限于文学的方式,还通过报纸、华文教育等其他渠道,因此要从多重角度来展开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从王德威新著《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文学史时间的新规划、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闻释,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新表述这几方面谈起,对“在世界中”现代文学史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了深入发掘。王德威关于中国现代性滥觞于1635年晚明时期的文学史分段,重新规划了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把中国现代性回归到中国历史中去探寻。用“在世界中”这一来自海德格尔的概念来阐释中国文学,不只是从“具有世界视野”和“进入世界视野”角度探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意义,同时也是以“在世界中”的语言、文本以及文学性表现的现代审美意义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所有这些都表明“新编”之名副其实,可以说开启了十分宽广的中国现代文学论域。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表示认同:中国文学原本就“在世界中”,只因华文文学是一个新兴学科,自身定义模糊,受对外政策影响大,当下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身处复杂、矛盾、多元的文化环境之中,我们要从维护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对一些“有问题”的作家,也应进行研究。此外,陈思和提出,“华文文学不是靠移民的子女进行文学创作来延续、发展,而是不断需要从母国走出去的移民进行写作”。

谈到华文文学的研究意义与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稀方提出,华文文学对于在多元化混杂中建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不能局限于本身,还要将华文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打通,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建构,争取实现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也认为,华文文学的概念突破了国别对文学研究的束缚,它使得我们更多地关注到文学的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从书写、阅读、传播、阐释等各个环节考察可知,中国文



学的内部和外部都绝非“均质”。边界模糊,内部多元混杂,外部蔓延多支。因此,看待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应当突破简单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认知。

“如何跨”“如何与”的问题意识

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桂林所谈到的,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它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强势的遮蔽,努力构建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中国文学在世界中,世界也在中国文学里,这是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除了大会主题发言之外,研讨还会以分会场的小组形式进行,经过为期两天的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各小组的讨论也各具特色,各有斩获。

西南大学教授李永东用跨界思维、文学史意识和文本细读功力来概括第一组的学术优势。例如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的《序幕是怎样拉开的:从晚清陈季同的旅欧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着眼于陈季同写作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语境”中发生的重要线索,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起始问题,同时又通过作品细读,展现其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破除了“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而与世界文学潮流有所“一致”。武汉大学教授赵小琪认为,第二组在材料性、观点性和方法性方面都很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汤朔则总结出第三组所呈现出的理论思考与史料研究并重的特点。

山东大学教授马兵作学术会议总结,认为此次会议以“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为题,其中“跨”和“与”两个词非常关键,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跨”“如何与”。两天的会议上,不少学者谈到了15年前也是在同一个会场举行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当时有来自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华语作家虹影、严歌苓,文学理论家叶维廉、张错在内的近200名学者、作家与会,让人看到了海外华文齐整的创作力量,众多作家也以实际的在场行为向现当代学科的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期待。15年来,华文文学界和现当代学界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回应这种期待,也即如何整合多源多流的文学脉络,建构一个多元的、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叙事。

乐琦:周老师,您好!很早就读过您的作品,您早期创作的长篇童话《中国娃娃》,被誉为媲美《小王子》的中国版成人童话。童话中的中国娃娃茉莉从东方到了西方,旅途中遭遇了生命的千姿百态,也遇见了世界各地的娃娃,这些仿佛是您自己的生命历程。从20年前一鸣惊人的“70后”内地作家,到赴美被称为“美国华文作家”,直至现在做《香港文学》总编辑,开始新的创作旅途,为什么会选择到香港?可以谈谈您心中的香港吗?

周洁茹:香港可能是最适合我和我的家庭居住的地方。我生活在香港,我对香港有情感;我写作香港,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

乐琦:《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是您对过去15年异域生活的纪念,记录了您自美国至香港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以“我的香港”为主题,可以分享其中一个香港故事吗?

周洁茹:《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出版于4年前。香港的故事,我放在刚出版的散文集《在香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中,这本书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中的一本,收录了《乌溪沙》《利安邨》《九龙湾》《马铁》《马鞍山》《未圆湖》《香港的人》《香港服务》《大围有个火锅店》……每一个都是很真实、很有意义的香港故事。

乐琦:移居香港后,一个个与众不同的香港故事在您的笔端不断丰富。您曾说过,自己有一个写作上的习惯,如果要改换生活的地方,就会写一个“到哪里去”以提醒自己下一步的创作方向。近来的《到香港去》《到广州去》《到深圳去》,清晰地标识出您对地理概念的敏感。香港、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有一天,您会不会创作一部《到粤港澳大湾区去》?

周洁茹:我就生活在大湾区之内。它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9市组成的城市群。大湾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同时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又各具特色。您提到的题目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我更喜欢从一个细部的角度去发掘一个城市的特点。或许《到山上去》《到惠州去》《到肇庆去》可能更容易把握。大湾区作为一个城市区,好比一串熠熠发光的珍珠项链,每一座都闪耀夺目,而每一颗又各具特色。一个作家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生活数年才能得到一个城市的真实味道。

乐琦: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香港文学作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核心之一,呈现出极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建立一个纽带,拉近粤港澳三地的距离,讲好共同的湾区故事,打造世界华语圈“文学湾区”的典范,推进湾区人民的心灵相通。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提及,要依托大湾区特色优势及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周洁茹:大湾区充满活力,既年轻又古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大湾区除了独特的港澳文化景观,还有葛洪的罗浮山、苏东坡的惠州西湖、黄飞鸿习武的佛山、广州等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人文胜地,又有深圳等创新型城市景观。同时还有享誉世界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澳门葡式美食,大湾区可以说具备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潜力。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香港高铁的建设,以及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地铁、轻轨建设,大湾区的交通将更加便捷,大湾区的吸引力将日益加强。我想在不远的将来,粤港澳大湾区就会成为享誉世界的旅游目的地。

“西洋”热土的中华文缘

欧洲,一个充满浪漫气息与神奇传说的大洲,一块在公元前8世纪即产生了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的土地,一个自古以来就成为以中国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遥远终点。它的面积有1016万平方公里,包括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上半叶,欧洲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洋”除了“大洋”以外的“西洋”热土,并且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汲取外国文学资源最多并给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极大影响的地方,不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如巴金、老舍、徐志摩、许地山、冯沅君、苏雪林、林徽因、冯至、艾青、梁遇春、戴望舒、钱锺书、陈学昭、梁宗岱、萧乾、季羡林等都曾先后留学欧洲。不过,他们对于欧洲文化从语言到精神更多的是借鉴而非融入。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在旅居欧洲时写成,但基本上都寄回中国,发表于国内的报刊,或于国内结集出版。即使侨居异域的时日较长,他们也很少将作品发表在异国他乡(如巴金、老舍等),并且他们大都学成即回国(除了季羡林因“二战”爆发而滞留德国较长时间外),无一“留而不走”。

与徐志摩、钱锺书、季羡林等前辈中国现代作家从欧洲汲取文化智慧然后回国从事创作或者著书立说不同的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逐渐聚集起一批先留学后定居并在异国他乡直接以母语创作并在其所在国直接发表作品的华文作家。如《莱茵通讯》在创办期间,前后发表了约1000名作者的2000多篇文章。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涌现了代表法国文学艺术最高荣誉机构的法兰西学院授予终身院士的程抱一,其小说《天一言》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女留学生山飒荣获法国四项文学大奖提名,并摘取中学生龚古尔奖桂冠;此外,还有吕大明、郑宝娟、蓬草(冯淑燕)、祖慰、绿绮士(陈重馨)等在中国大陆或台港地区知名度较高的华文作家。而在德国和瑞士则有德国籍的关惠谦、瑞士籍的赵淑侠等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领域的重量级作家。

欧洲有着数千年丰富、博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曾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文化骄子,为整个世界和人类奉献了至今仍熠熠闪光的璀璨的艺术珍品。欧华作家浸润其中,汲取其精华,以西洋风融中国情,以欧洲纳汉魂,面向世界呈献出不少堪称一流的好作品,使得欧华文学从最初就有了相当高的起点和文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赴欧洲留学生人数以及华人新移民的增多,以母语创作的华文作家人数和作品逐年增加,并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影响逐渐扩大,如目前定居于德国的谢盛友、麦胜梅、黄雨欣、郑伊雯、穆紫荆、黄鹤升、谭绿屏、王双秀、高关中、刘瑛、倪娜、昔月、夏青青以及近年移居德国的严歌苓等,英国的虹影、文俊雅等,瑞士的朱文辉(余心乐)、黄世宜、宋婷、朱颂瑜等,奥地利的俞力工、王若珠、方丽娜、叶小明、安静等,比利时的章平、郭凤西等,荷兰的丘彦明、林涓、池莲子等,法国的梁源法、黄冠杰、施文英,丹麦的池元莲,西班牙的莫索尔、张琴等。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中东欧的华文作家及作品也开始崭露头角,如捷克的老木、匈牙利的余泽民、张执任、阿心等等。在他们中间,有的已成为驰名华文文坛的著名作家,屡屡斩获世界华文文学各种大奖;有的作品屡屡在国内外的华文报刊上发表与出版,并入选世界华文文学各种文集,影响日益扩大。这些欧华作家的特征是:其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及文学修养普遍较高,且不少人皆能用双语进行创作和发表作品,这与北美、东南亚等国的华文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不同。

当代欧华文学团体与载体

不过,欧洲国家众多,语种颇杂,华文作家的分散、孤立、封闭与疏离的特点,也造成了欧华文学自身交流及与外界沟通的困难。为了改变这一现状,1981年8月27日在法国里昂成立了欧洲华人学会。1983年5月,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欧华学报》问世。这是欧洲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份中文版的华人纯学术刊物。学报以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为主,兼顾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同时设有书评专栏,并介绍欧洲华人学者的动态、中欧文化交流信息、会员新书等,不定期出版。《欧华学报》的创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发展,对当地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加上此前吴谦1980年创办的《德中论坛》,以及1982年《欧洲日报》《欧洲时报》《西德侨报》3份设有副刊的华文报纸先后创刊,使得欧华文坛面貌有所改观,华文作者有所增加。此后,钱跃君创办华文刊物《莱茵通讯》,从1987年至2006年,该刊坚持了20年之久,发行总量近30万册。此外,至今尚存的几家华文报刊《欧洲时报》《欧华导报》《华商报》《欧洲新报》,这些华文报刊无疑对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91年3月,以赵淑侠为创会会长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成立,使原本分散而又各自孤立于欧洲各国的华文作家组合起来,有了精神归属的“家园”。欧华作协创会会员有60多名。创会宗旨是:促进中欧文化交流,与各国写作同仁联谊,提携后进,培植新人,以免欧洲华文文学出现断层。该协会成立后,每两年在欧洲各国轮流召开欧华作协双年会,至今年5月已经举办了13届欧华作协双年会暨文学研讨会。加上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等文学社团,推出了《走进德国》《多瑙河的呼唤》等多人作品选集,不仅显示出欧华文学方兴未艾的良好势头,而且也是对当今中东欧华文文学成果的集中展示与检阅。今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在法兰克福联合主办了“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共同研讨欧洲华文文学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趋势,展现了在中国本土以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美好愿景。

欧华文学的艺术特质

欧洲的华文文学与北美或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有显著不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华文文学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产生于世界语种最多样、文化传统悠久丰富的大洲,具有哲学、美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宗教等的深厚积淀、互相渗透与水乳交融,在文学中蕴含哲思、色彩、旋律与智慧等,使读者享受审美的愉悦。其次,当代欧华作家虽不乏感时忧国之责任,但更看重文学本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因而较多地潜心于艺术、灵性和审美,正如旅法女作家吕大明所言:“艺术家命中注定只能受雇于美神。”此外,欧华文学“灵根自植”中华文化、文学的传统与欧洲文学中崇尚人性、推崇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雍容华美、优雅幽默的文风的交织融合,形成了欧华文学与众不同的特质。

例如,吕大明的散文之所以与众不同,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她的散文乃属一种中西荟萃、精致典雅的“文化散文”,其中饱蘸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深厚底蕴与文学艺术的丰富学养,既有国学的精深根基,又兼西学的丰厚底蕴。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坛上,通晓一两门外语并能用汉语以外的文字写作者也许并不少见,但像吕大明这样在散文中能显示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与广博学识、能自由出入古今中外文学典籍的女作家,实不多见。翻开她的散文,随意之间你就会发现她在散文中提及的中西经典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多样且密集,从耳熟能详的著名文学大师到并不出名甚至冷僻生疏的作者及其作品,无不信手拈来,这在当今女性散文中实属罕见。她还深深陶醉于西方的艺术大师及其佳作,她在散文中提及的著名音乐家(如莫扎特、布拉姆斯等)、雕塑家(如米开朗基罗、罗丹等)、画家(如波提切利、莫奈、梵高等)等数不胜数。文学与艺术本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的精神往往同气相求。尤其是她的散文擅长在东西方文化、文学艺术中有一种自觉的比较视角,例如那篇堪称经典美文的《来我家喝杯茶》,从“英国人最讲究喝茶”说起,不经意间便将英国人“喝茶文化”的悠久传统、贵族“茶宴”的繁文缛节及其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刻板、客套、虚应的文化特征凸显出来。然后,由意大利人将“社交当成一种艺术”又联想起中国古代的杭州茶肆,在看似东“拉”西“扯”的闲笔中,做了一番“喝茶文化”所流露的东西方的民族性格、审美趣味和文化差异的比较。因此,读吕大明的散文,犹如自由出入东西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园林,可以摘采下许多奇花异果。当然,在其他诸多欧华作品中,也同样可以欣赏到富有艺术气质的美文佳篇,这正是当今欧华文学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